

師友記往

余英時自著



——余英時怀旧集

彭国翔编

余英时作品系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余英时作品系列

師友記往

余英時自著



——余英时怀旧集

彭国翔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 251

Y77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师友记往: 余英时怀旧集 / 余英时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1
(余英时作品系列)
ISBN 978-7-301-21482-4

I. ①师… II. ①余…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4856 号

书 名: 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

著作责任者: 余英时 著 彭国翔 编

责任编辑: 吴 敏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482-4/K · 090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 pkuphilo@163.com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11.5 印张 98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序

北京大學出版社和彭國翔先生合作，決定為我出版一套別出心裁的作品系列。這一系列包括一部散文集，一部自序集，一部懷舊集，也許還加上
一部訪談錄。我為什麼說「這一系列是別出心裁呢？」因為其中所收都
是我個人感所思之作，與我立一般史學論著中儘量將自己放逐在外的
風格，直成鮮明的對照。如果借用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的概念，前者屬
於「有我之境」，後者則屬「無我之境」。這「有我之境」便是本系列別出心裁之所在。
一九四九年秋季，我在燕京大學歷史系讀過一學期；燕國的師友和風景後來
一直繫繫在我的心頭。一九七八年十月，我隨美國漢代研究代表團訪問北京大學，
其他團員者然都認為是到了北大，祇有我一個人感覺是回到了離別二十九
年的母校。我清楚地記得，在我們一群人經過未明湖畔時，我還極其匆忙地
獨自跑到當年的宿舍（燕大第二食堂）去探望了一下。現在北京大學出版社
為我刊行的這一系列，我却仿佛感到這是我母校對於一個遠方校友的親切
照顧。彭國翔先生費了極大的心力編選這一系列，我對他的感激不是一
句空言所能道謝之語能夠表達於萬一的。是為序。

余英時 二〇二二於美國普林斯頓

“余英时作品系列”

自序

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彭国翔先生合作，决定为我出版一套别出心裁的“作品系列”。这一系列包括一部散文集、一部自序集、一部怀旧集，也许还加上一部访谈录。我为什么说，这一系列是别出心裁呢？因为其中所收都是我个人所感所思之作，与我一般在史学论著中尽量将自己放逐在外的风格，适成鲜明的对照。如果借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概念，前者属于“有我之境”，后者属于“无我之境”。这“有我之境”便是本系列的别出心裁之所在。1949年秋季，我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过一学期，燕园的师友和风景后来一直萦系在我的心头。1978年10月我随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访问北京大学，其他团员当然都认为到了北大，只有我一个人感觉是回到了离别二十九年的母校。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一伙人经过未名湖畔时，我还极其匆忙地独自跑到当年的宿舍（燕大第二食堂）去探望了一下。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刊行作品系列，我却仿佛感到：这是母校对于一个远方校友的亲切照顾。彭国翔先生费了极大的心力编选这一系列，我对他的感激不是一句寻常道谢之语能够表达于万一的。是为序。

余英时

2012年2月10日于美国普林斯顿

師友記往 | 目录 |

- 1 刘大中先生与新亚书院 (1975)
- 6 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 (1981)
- 21 吴君火狮行谊 (1986)
- 24 犹记风吹水上鳞 (1990)
- 36 一生为故国招魂 (1990)
- 46 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 (1991)
- 73 费正清与中国 (1991)
- 107 追忆牟宗三先生 (1995)
- 113 追忆费景汉先生 (1996)
- 115 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1996)
- 125 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 (1998)
- 132 谈钱锺书 (与傅杰的问答) (2008)
- 139 悼念邢慕寰教授 (1999)
- 141 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 (2001)
- 150 一位尊人爱国的伟大书生 (2002)
- 155 追记与唐长孺先生的一次会谈 (2004)
- 162 回忆诗友兼戏伴陈颖士 (2011)
- 170 编后记
- 175 编后记之二

刘大中先生^[1]与新亚书院（1975）

大中先生伉俪的逝世，我个人感到特别悲痛，虽然我认识他们两位为时尚不足十年。我的悲痛主要是起于大中先生最后受聘为香港新亚书院校长这一件事。1973年至1975年我从哈佛告假回香港母校服务，事先说明是为期两年。到了1974年的8月，新亚书院董事会还没有能够物色到校长继任人选，我当时非常焦急，曾各方面请朋友们设法荐贤。不料在我几乎已觉绝望之际，邢慕寰先生忽然给了我一个喜出望外的好消息：他已说动了大中先生前来继任新亚校长的职位。这个消息不但使我个人如释重负，而且也给整个新亚书院带来了狂欢和希望。其实，在真正了解大中先生的人看来，这件事并不算太意外；因为大中先生晚年一心一意想为中国社会、中国人、中国学术和教育尽一番心力。

大中先生于今年1月间签字接受了新亚校董事会的聘约，同时又趁寒假访台之便偕同刘夫人亚昭到香港小住了几天，借以了解新亚的情况。在这次访问期间，我天天和大中先生夫妇在一起，一方面叙旧，一方面交换关于新亚的意见。临行时大中先生说他将于本年8月1日到港就职，我们约好7月底在台北碰

[1] 刘大中（1914—1975），著名计量经济学家，《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传记的唯一一位华裔学者。生于北平，1940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曾执教于清华大学。1958年起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授直至逝世。1960年膺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说：“台湾经济之有今日，当时（二十年前）都说‘六院士’，即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邹至庄、顾应昌、费景汉等六人建言有功。”1975年因肠癌逝世于美国，其妻服药身殉于侧。

面，商量交接事宜。

大中先生回美后就开始闹肠胃病，后来他来信说是胆石问题，已经开了刀，但腹痛腹泻未止，还要继续检查。我当时就有一点敏感，曾和朋友们提起过，恐怕病情不甚简单。朋友们认为我太过虑了。不料到了5月间，我果然从台北得到间接的消息，说他患了癌症。我当时为之震动不已，只希望这是不可靠的传闻。但不久我就辗转获得一份大中先生亲笔给台北友人报告病况的函件复本，才知道他不但患了肠癌，而且已蔓延到了肝部。

5月29日我曾写了封信给大中先生，旁敲侧击地询问他的近况，因为他没有直接写信来告诉我关于癌症的事，我不便冒昧地提到这一点。大中先生于6月8日写了一封四页的长信复我，除了叙述病况外，主要是商讨关于新亚校长职位的事。那时他自己还相当乐观，认为一定可以治好恶疾。但关于新亚职位事他提出了两个方案，要我们决定其一。他说：

（甲）准弟辞去新亚校长之聘约，弟虽对控制癌疾之信心甚强，但究系已有病之人，工作效率恐将减低。……新亚任务重要，无用一病人之必要。新亚董事会如觉以解除聘约为较宜，弟绝不介意（只觉歉仄）。

（乙）7月底如此间医生认为弟之病状及精力可去港服务，弟仍按原约去港，惟须稍迟一个月左右到差。……新亚为国人以自己能力于艰苦环境中所创立发扬者，故愿效绵薄，辅助其继续发展，前决定去港即为此，现时亦然。

新亚方面当然希望大中先生能治好病来港就职，所以我立刻代

表学校打了一封电报给他，请他安心医治，稍迟到任无妨。但最使我感动的是大中先生虽身罹不治之症而仍念念不忘新亚，不忘为中国人服务，更不肯临难畏缩，背弃承诺。他在同一信中曾两度引用“君子一诺，重于泰山”这句话。我现在重读这八个字，尚感到大中先生那股侠义之气从纸上跃然而出。



1967年7月，刘大中在梨山行馆为蒋介石做解说

我本来是准备经过台北返美，以便和大中先生聚谈一次的。到了6月中旬，大中先生已显然不能如期东返，我就接受了巴黎第七大学的邀请，在7月中旬到巴黎去访问法国的汉学界，顺便在欧洲各地游历了近一个月。8月7日我回到波士顿，第一件事便是和大中先生通电话，询问病况。最初他的电话总是无人接，一直到8月10日下午，我们才和刘夫人及大中先生通了话。刘夫人的语气显得十分平静，绝无悲痛或慌乱的表示。我们最初有些诧异，事后回想才恍然大悟，原来她的死志已决了。大中先生的语调十分微弱，已全无平时那种意气风发的味道。我记得他说，他已正式向新亚董事会提出辞职，因为他的癌病已无法阻遏，现在已发展到了肺

部。他一面说着一面咳嗽。他又告诉我，西医对他的病已不能医治，而且他的体重也只剩下九十磅左右了。我听了这些话内心悲痛不胜，然而却找不出一个字来安慰他。在这种情形下，我又能够说什么呢？我们通话的三天之后，他们夫妇便一起开车住进了康乃尔大学附近的“假日旅馆”，双双服药自杀了。我最初听到大中先生一个人的死讯，已奇怪他何以走得这么快。当晚立即写了一封唁函给刘夫人，第二天信尚未寄出，又听到了刘夫人殉夫相偕而去的消息。我的感觉简直完全麻木了。以后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的精神始终不能从这一悲剧的震荡中恢复过来。我时时在想象着他们夫妇在“假日旅馆”自杀前的一番心情和景象。大中先生夫妇都雅好平剧，大中先生更是出色当行，但万万料不到他们竟是如此戏剧化地结束他们的生命，给人间留下了一幕用至情至性写出的悲剧！

回想从大中先生去年9月应允接任新亚校长，到今年1月访港，以至最后去世，总共不足一年的时间。“人世无常”的话我是听惯了的，但是这一次才真正体验到这句话的沉痛意味。

最近一个多月来，我自己才慢慢地克服了大中先生遽然逝世所给予我的消极影响。大中先生自己曾说，他一生对学术、对教育、对社会已尽了最大的心力，纵或万一，已无遗憾。中国古代哲人对生死问题说得最好的还是张横渠“存，吾顺事，没，吾宁也”那句名言。什么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还不免把个人生命看得太重要，也不免仍有些俗气。大中先生夫妇在生死之际的表现则正合乎横渠所悬的道德标准。大中先生虽未能履新亚书院之任，但在精神上新亚的师生已把他看做是他们的校长，我个人站在新亚校友的立场上也完全觉得他是母校的校长，而且是一位

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校长。大中先生去年9月30日给我的信上说：

弟受国家培养卅余年，而为他人作嫁衣裳者数十年于兹矣，常自内惭。前常愿为台湾服务，惟事涉经济行政，难期其道之必行，亦无贡献。新亚之学子为我同胞，如有机会稍尽绵薄，自所夙愿。

这几句话最足以表现大中先生“存，吾顺事”的精神。我们在海外的后死者都应该时时体味这番话的含义，而新亚的同学们更应该从这番话里去认识这位未到职的校长的崇高人格！

1975年10月31日清晨

顾颉刚^[1]、洪业^[2]与中国现代史学(1981)

1980年年底中国史学界不幸失去了两位重要的人物：顾颉刚先生和洪业（煨莲）先生。两位先生都是1893年出生的；逝世的时间也仅仅相差两天：洪先生卒于12月23日，顾先生卒于25日。

顾先生是苏州人，系出著名的吴中世家，早年所受的是中国传统的经史教育；洪先生原籍福建侯官，早年就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并且是在美国完成正式教育的。但是尽管他们的家世和文化背景都不相同，在史学上两位先生却很早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了。洪先生是1923年从美国回到燕京大学任教的，这正是顾先生以《古史辨》轰动中国学术界的一年。洪先生在美虽治西洋史和神学，但回国之后治学的兴趣很快就转到中国史方面来了，这是和当时胡适之、顾颉刚诸先生所倡导的“整理国故”的运动分不开的，而顾先生对他的影响尤大。洪先生生前曾屡次和我提到这一点，绝不会错的。1929年顾先生到燕京大学历史系

[1] 顾颉刚（1893—1980），字铭坚，江苏吴县人。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1920年北京大学本科哲学门毕业以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

[2] 洪业（1893—1979），号煨莲，为英文名威廉（William）的同音异译，福建侯官人，著名史学家、教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归国后被聘为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45年以后定居美国，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等职。洪业在国学研究上成就卓著，尤其是在索引编纂方面贡献良多，代表作品包括《蒙古秘史源流考》、《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礼记引得序》、《春秋经传引得序》、《杜诗引得序》等。

来担任古代史的教学，他和洪先生在学术上的合作便更为密切了。最值得纪念的是他们共同发现崔述夫妇的遗著和访问崔氏故里的一段经过。最近顾先生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上）一文中曾特别回忆到这一段。他说：

当五四运动之后，人们对于一切旧事物都持了怀疑态度，要求批判接受。我和胡适、钱玄同等经常讨论如何审理古史和古书中的真伪问题。那时我们就靠了书店主人的帮助，找到了这部《崔东壁遗书》。后来我同几位燕京大学的同事在图书馆里找到了崔述的《知非集》，又组织了一个旅行团到大名去采访，看到了他墓碑上的记载，又借抄了崔述的夫人成静兰的《二余集》，崔述的笔记《菽田随笔》。（英时按：原名《菽田剩笔》，顾先生误忆。^[1]）

这里所说燕京大学的同事其实主要是指洪先生，因为《知非集》是他在燕大图书馆中发现的，而《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一文也是由洪、顾两先生共同署名发表的。^[2]顾先生不提洪先生之名，大概是有所顾忌，而胡先生因为已获得公开的“解放”，所以反而不必避讳了。

洪、顾两位先生恰好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主流，即史料的整理工作。在这一方面，他们的业绩都是非常辉煌的。以世俗的名声而言，顾先生自然远大于洪先生；“古史辨”三个字早已成为中国知识文化界的口头禅了。但以实际成

[1] 见《中国哲学》第二辑，1980年3月，第337页。

[2] 见《崔东壁遗书》，台北：河洛出版社影印本，1975年，特别是顾先生在《遗书》“序”中对洪先生表示感谢的一段，见第3页。



顾颉刚

就而论，则洪先生绝不逊于顾先生。洪先生三十岁以后才专治中国史，起步比顾先生为晚，然而顾先生由于早年遽获大名之累，反而没有时间去沉潜的工夫。所以得失之际，正未易言。最后三十多年间，他们两人的学术生命尤其相差得甚远；顾先生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太大，许多研究计划无法如期实现。例如《尚书》译注的工作，在《古史辨》时代即已开始，60年代在《历史研究》上

续有新作，但全书似乎未及完篇。（最近两年发表的，有关《甘誓》、《盘庚》诸篇主要是由他的助手代为完成的。）所以就最后三十余年而言，他的成绩不但赶不上《古史辨》时代，而且也不能与抗日战争期间相比，因为即使在抗战的那种困难条件下，顾先生尚能有《浪口村随笔》之作（后来正式出版的《史林杂识》即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实在不能不令人为之扼腕。对照之下，洪先生在同一段时期里却仍能不断地在学问上精进不懈。洪先生是在1946年春间应聘到美国哈佛大学来讲学的。据他有一次谈话中透露，他当初只打算在美国住一两年，借以补足战争期间接触不到国外汉学研究的缺陷。但是后来中国的政治局势变化得太快，他终于年复一年地在美国住了下来。

从1946年到1980年，洪先生发表了许多分量极重的学术论

著。举其荦荦大者，英文专著有《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上下两册，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英文论文有《黄遵宪〈罢美国留学生感赋〉译注》（《哈佛亚洲学报》，卷十八，第一、二号，1955年6月），《钱大昕咏元史诗三首译注》（同上，卷十九，第一、二号，1956年6月），A Bibliographical Controversy at the T'ang Court（同上，卷二十，第一、二号，1957年6月），A T'ang Historiographer's Letter of Resignation（同上，卷二九，1969年）。中文论文之较为重要者则有《破斧》（《清华学报》新一卷，第一期，1956年），《再论臣瓚》（同上，新三卷，第一期），《〈韦弦〉、〈慎所好〉二赋非刘知几所作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下册，1957年5月），《再说西京杂记》（同上，第三十四本下册，1963年12月）。

凡是读过洪先生论著的人都不能不惊服于他那种一丝不苟、言必有据的朴实学风。他的每一个论断都和杜甫的诗句一样，做到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的境地。但是洪先生晚年最精心的著作则是刘知几《史通》的英文译注。他对《史通》的兴趣发生得相当早，认为这部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对史学体例进行了系统讨论之作。因此他发愤要把它译出来，让西方人知道中国史学造诣之深和发展之早。前面所列的单篇论文，其中不少便是《史通》译注的副产品；而1969年的A T'ang Historiographer's Letter of Resignation事实上即是《史通·忤时篇》的译注。由于他的态度认真，不肯放过《史通》原文中每一句话的来历，译注工作所费的时间几乎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记得十五六年前洪先生曾告诉我，他已戒掉了烟斗，要等《史通》译注完成后才开戒。但他究竟最后有没有照预定的计划结



洪业

束这一伟大的工程，我现在还不十分清楚。希望整理洪先生遗著的人要特别珍视这一方面的文稿。洪先生为了要整理出一个最接近本来面目的《史通》本子，曾进行了精密的校勘工作。除了他以前在燕京大学所校的多本外，近几十年来又广搜各种异本。其中最重要的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乌丝栏抄本（原为明抄本，是最接近宋刊本

的一种），和郭孔延《史通评释》（这是最早的注释本，刊于1604年，原藏抗战前日本人所办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现亦归史语所），以及台北“中央图书馆”所藏的明刊蜀本《史通》。我曾不止一次向洪先生提议，请他整理出一个最理想的校本，分别刊行，以取得与译注相得益彰之效。他表示十分同意我的看法。希望我们能在洪先生的遗稿里发现这样一部完美的校本。

洪先生平素与人论学，无论是同辈或晚辈，绝对“实事求是”，不稍假借。他博闻强记，最善于批评，真像清初人说阎若璩那样，“书不经阎先生过眼，谬误百出”。1958年周法高先生去哈佛大学访问时曾以《颜氏家训汇注》的稿本送请洪先生评正，后来周先生告诉我，洪先生曾指出其中可以商榷之处不下百余条。但是另一方面，洪先生却深受中国“温柔敦厚”的诗教传

统的熏陶，对古人不肯稍涉轻薄。1954年胡适之先生曾经多次与洪先生为全谢山问题发生争论，书札往复不休，关键便在于洪先生认为胡先生说全谢山吞没赵一清（东潜）《水经注》校本，是一种不应有的厚诬古人。在10月20日一封长信中，洪先生特别强调“罪疑惟轻”的古训；在12月8日一封更长的信中论及赵东潜《接谢山札云典衣得三缙聊助客乏寄谢》诗则说：

谢山之贫，东潜不容不知。三缙虽无济甚事，言谢之诗
诤可顿违温柔敦厚之教。业稍读二家书道及彼此之处，止觉
彼二人交谊，终始无嫌。彼此征引虽亦间加纠正，总见称是
多于言非。盖从他山之攻，转显丽泽之益。此亦儒林佳话，
可风来学。^[1]

其实洪先生这几封信宅心之忠厚，真足以风今世，学问的深湛尚是余事耳。1973年哈佛燕京社的同仁们发起一个祝贺洪先生八十岁生日的集会。我当时曾写了一首七律为寿。诗曰：

矫矫仙姿八十翁，名山业富德符充。
才兼文史天人际，教寓温柔敦厚中。
孙况传经开汉运，老聃浮海化胡风。
儒林别有衡才论，未必曹公胜马融。

“学际天人，才兼文史”是《旧唐书》刘知几及其他史官列传末的史臣评语；“温柔敦厚”则正是指洪先生的人格修养而言

[1] 原信影本见《胡适手稿》第六集卷一，第144页。